

焦點評析

阿拉伯之春十年：中東、北非地區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The Arab Spring at Ten Years: MENA's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崔進揆 *Chin-Kuei Tsui*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壹、前言

2010年12月，北非國家突尼西亞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抗議運動，執政超過二十年的班·阿里（Ben Ali）政權在運動中被群眾推翻，該一事件被視為是「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運動的起源。此外，因為突尼西亞的國花是茉莉花，所以突尼西亞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又被稱為「茉莉花革命」。雖然阿拉伯之春運動最初起源於北非的突尼西亞，但該運動本身對於區域安全和國際政治的發展及影響卻非常深遠。除了突尼西亞的班·阿里政權，利比亞的葛達費（Muammar Gaddafi）政權和埃及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權同樣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被推翻。敘利亞、葉門和巴林地理位置雖在阿拉伯半島上，但亦受到阿拉伯之春風潮的影響，三國政權的統治基礎在運動中遭受到嚴重的衝擊與挑戰。敘利亞和葉門因為阿拉伯之春運動而陷入長期的內戰，衝突衍生出的人道危機引起國際社會和人權團體的高度關切；巴林的情勢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派出軍警強勢鎮壓之故，群眾運動

在尚未失控之前便受到控制，巴林的王室政權得以延續。整體而言，中東、北非地區受到阿拉伯之春運動影響的國家甚多，但僅有突尼西亞在這波運動中一支獨秀，成為唯一成功的個案，其他國家不是陷入永無止盡的內戰，就是出現政權更替頻繁的狀況，政治情勢高度不穩。在阿拉伯之春運動屆滿十年之際，本文試圖對目前中東、北非地區的情勢做一總評，淺述該一運動對於區域和國際局勢所帶來的影響。

貳、阿拉伯之春運動對區域國家的影響

阿拉伯之春運動被部分論者視為是中東、北非地區的民主化運動，許多區域內長期執政的獨裁者皆在這波民主化的浪潮中被推翻，包括突尼西亞的班·阿里、利比亞的葛達費和埃及的穆巴拉克，這些獨裁者在各自國家長期執政，在過去從未受到類似阿拉伯之春運動如此大的政權挑戰，但在這波運動中卻黯然下台，不是流亡海外，就是慘死於內戰中。事實上，學界關於中東地區民主化的討論一直都有，阿拉伯之春運動只是讓學術研究的焦點再次投注於中東、北非地區。1990年代前後，受到冷戰結束和共產蘇聯勢力瓦解的影響，東歐國家出現了民主化的浪潮，前南斯拉夫邦聯更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出現大規模政治暴力和內戰的狀況，著名的例子如發生於1990年代的波士尼亞內戰和科索沃問題等。然，相較於東歐，中東、北非地區卻相對平靜，雖然1990年代初期區域內曾發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聯合國行使集體安全制度，發動軍事行動打擊伊拉克的事件，但同樣遭逢冷戰結束和共產蘇聯勢力衰退等因素，中東和北非地區卻並未出現大規模民主化的浪潮。學界關於中東地區民主化的議題曾有所謂的「伊斯蘭例外論」(Islam Exceptionalism)的研究，探討伊斯蘭世界回應西方國家要求其民主化，施行政教分離等世俗主義(secularism)理念與伊斯蘭傳統價值之間的抉擇衝突。¹

¹ Shadi Hamid, "Is Islam 'Exceptional'?" *The Atlantic*, 6 June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6/06/islam-politics-exceptional/485801/>; also see Shruti Godbole, "Is Islam Exceptional? And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Future of

在諸多受到阿拉伯之春運動影響的國家中，突尼西亞做為運動的起始國，也是目前唯一成功的個案，其他國家不是陷入內戰的紛擾，就是長期處於政權高度不穩的狀況。突尼西亞的民主化運動之所以成功，可歸納於下列幾個重要的因素。首先，突尼西亞並不具備地緣政治或戰略的重要性，因此外國勢力進行干預的誘因不高，連帶使得問題相對單純。其次，中產階級對突尼西亞社會的影響力是該國的特色，扮演著穩定國家的重要力量。再者，相較於其他國家，突尼西亞族群分佈較單純，因此不易因為族群和宗教因素產生分裂和內戰。² 最後，因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相對穩定，促使外資和外國企業有投資該國的高度意願，亦使得突尼西亞政局較諸於其他國家顯得相對穩定。2015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就是頒發給突尼西亞工會、人權協會、律師公會、工業及貿易與手工業聯合會所組成的「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The 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表彰其中介、調停各方勢力和維護突尼西亞民主的貢獻。³ 「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成員的組成，顯示突尼西亞社會的多元特色，以及公民團體和中產階級扮演穩定該國社會力量的關鍵。⁴

反觀，受阿拉伯之春運動影響的其他國家，其民主化的進程就不如突尼西亞順利。埃及在過去十年出現政權更迭的狀況，阿拉伯之春運動上台的穆爾西 (Mohamed Morsi) 政府遭到軍事政變，而軍人出身的塞西 (Abdel Fattah Al-Sisi) 雖在 2014 年掌政，但任內出現行政部門貪腐的醜聞，又打壓穆斯林兄弟會 (Muslim Brotherhood)，將其正式列為恐怖主義團體，民意基礎並不穩固。利比亞則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陷入嚴重的內戰，過去更出現全國團結政府 (Government of National Accord, GNA) 和哈夫塔 (Khalifa Haftar) 兩個

Western Democracy?,” *Brookings*, 15 May 2018,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18/05/15/is-islam-exceptional-and-what-does-it-mean-for-the-future-of-western-democracy/>

² 突尼西亞人口組成約 98% 為阿拉伯人，且 99% 為信奉順尼伊斯蘭的穆斯林。“Tunisia,” *The World Factbook 2021*,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tunisia/>

³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5,” *The Nobel Prize*, 10 October 2015,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eace/2015/press-release/>

⁴ *Ibid.*

政權，前者受到聯合國的承認，後者則主要為俄羅斯和部分阿拉伯國家支持，國家呈現分裂的狀況，兩政權間時有衝突爆發。阿拉伯半島上的敘利亞和葉門則是面臨內戰、恐怖主義威脅和大規模人道危機的問題。根據聯合國難民署（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s for Refugees, UNHCR）2021 年的統計，敘利亞內戰爆發迄今已產生將近 660 萬的難民，1,340 萬人急需人道援物，⁵ 而葉門亦有 13.7 萬的難民，以及超過 2,000 萬人需要國際社會的人道關切。⁶

參、阿拉伯之春運動對國際政治與國際社會的影響

阿拉伯之春運動雖然主要影響區域為中東和北非，但其所產生的政治效應卻遠超越中東、北非，各界主要關懷的議題包含：難民問題、社群媒體、國際干涉等。受到阿拉伯之春運動的影響，敘利亞自 2011 年起出現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運動，而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府因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成效未能滿足民眾的期待，最終以強制的方式來鎮壓群眾運動。伴隨政府的強力鎮壓和國家暴力的使用，敘利亞陷入嚴重的內戰，後又面臨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的恐怖主義威脅，國家呈現分崩離析的狀態，亦因此產生龐大的難民。許多來自敘利亞和中東、北非地區的難民選擇歐洲國家做為展開新生活的起點，歐洲國家面臨了二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難民危機。難民的移入不僅衝擊了歐盟和歐洲國家的難民與邊境管制政策，伊斯蘭的宗教和文化更對以基督教和天主教為主的歐洲國家與社會產生強烈的文化衝擊，而過去十年間一連串的伊斯蘭恐怖攻擊事件，更激化許多（極）右翼的政黨在歐洲迅速崛起，包含德國的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fD）、法國的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 NF）、義大利的五星運動黨（Five Star Movement）等。（極）

⁵ “Syria Emergency,”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https://www.unhcr.org/syria-emergency.html>

⁶ “Yemen Emergency,”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https://www.unhcr.org/yemen-emergency.html>

右翼政黨和政治人物透過鼓催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民粹主義(populism)強調反移民、反伊斯蘭的理念，並在選舉中獲得許多歐洲選民的支持，目前大多數歐盟國家的國會皆有(極)右翼政黨的勢力。

除了難民議題，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影響公共議題和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功能也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受到關注。在阿拉伯之春運動期間，社群媒體，如：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被公民團體和反政府示威遊行廣泛運用，透過社群媒體所提供的平台，集會、遊行的時間、地點和相關資訊得以被快速地轉傳，提升公民團體和示威遊行組織活動的效率和媒體能見度，更有助於活動和理念的推動。社群媒體在阿拉伯之春中的成功經驗開始被中東、北非地區外的許多民運人士、政治人物，乃至於極端恐怖主義團體所重視。2013年香港的佔中事件和2014年台灣的太陽花學運皆可以看到社群媒體被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行動者用來做為活動宣傳和集結群眾的工具，並透過網路世界達到將活動推向「國際化」的效果。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民主、共和兩黨的候選人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和唐諾川普(Donald Trump)皆計畫性地經營個人的臉書和推特帳號，並藉由社群媒體的平台來進行政治的宣傳，串連支持者。然而，社群媒體的影響力並非總是正向的，其亦為許多極端恐怖主義團體做為文宣和招募成員的工具，最著名者莫過於2014年成立的伊斯蘭國(IS)。此外，近年許多專制極權的國家也透過社群媒體來發動資訊戰，試圖滲透民主國家和其社會，進而干預特定國家的政局，並影響選舉的結果。俄羅斯、中國大陸和伊朗皆有被美國和許多西方國家指控的紀錄。

最後，國際社會針對類似阿拉伯之春等公民不服從運動是否應進行國際干預的問題也成為各方探討的焦點，而做為中東、北非地區最重要域外行為者的美國也成為遭受批評的對象。美國政府的態度與立場之所以會受到許多的批判，主要原因在於相較於在利比亞和埃及事件中的積極作為，美國政府對巴林的示威抗議運動卻選擇沈默，並未譴責巴林政府和進行干預的沙烏地

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因此被批評者質疑具有雙重標準。針對利比亞情勢，美國和英國、法國進行了軍事性的干預，對於穆巴拉克政權也曾公開呼籲埃及政府必須回應民意和釋放權力，但對於巴林的群眾運動卻選擇性地保持沈默。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皆是波灣地區親美的國家，也是美國過去在中東地區推動反恐，以及維持區域霸權地位的重要盟邦，美軍第五艦隊的總部就設在巴林。巴林若出現政權輪替的狀況，將連帶波及海灣幾個重要國家的政局，更可能直接影響石油、天然氣等國際重要戰略能源的供需。是故，美國政府在權衡區域情勢，以及穩定中東地區政局的情況下，不願出面干涉巴林的示威運動。事實上，大多數的海灣國家皆是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政府和行政部門的要職一向由皇室成員和其親信出任，而阿拉伯之春這種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其所衝擊的就是這些皇室政權國家的統治基礎，且相較於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皇室政權更重視的是自身的政權安全（*regime security*）。美國政府在運動中採取選擇性干預的作法，其實並不利於自身在伊斯蘭世界中所欲建立的正面形象。⁷

肆、結論

阿拉伯之春運動的十年間中東地區的政局出現快速的變化，除了本文談到的幾個國家，阿爾及利亞、蘇丹、黎巴嫩、伊拉克等國的局勢在近幾年亦呈現高度不穩的狀況，阿爾及利亞和蘇丹更出現政權的更替，因此許多論者以「阿拉伯之春 2.0」來形容阿爾及利亞、蘇丹、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情勢。不論是第一波的阿拉伯之春運動，或是後來的阿拉伯之春 2.0，受影響的國家在國家治理、貪腐、經濟遲滯等議題上皆有許多相似的共同點，而政府雖承諾會推動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改革，但改革的速度和成效明顯並不符合民眾的期待，故選擇走上街頭對抗政府和統治階級。突尼西亞成功的經驗是少數的例

⁷ 美國因為小布希政府推動的反恐戰爭，以及 2003 年侵伊戰爭與阿布格里布虐囚案，國家整體形象在伊斯蘭世界受損，歐巴馬就任總統後將改善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列為施政的重點目標之一。

外，該國的經驗不見得適用於其他的國家，因為各國的國情和社會組成不同，中東、北非地區的國家和人民最終還是需要找出一個最貼近民意又符合自身國情的治理方式。另，在高度網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伊斯蘭世界和外界的聯繫更加地密切，較之於西方文化，伊斯蘭文化相對保守，伊斯蘭和阿拉伯國家未來依舊會面臨著全球化現象所帶來的諸多挑戰。此外，阿拉伯之春運動和過去十年區域情勢的發展也給予西方國家和研究者許多的省思，亦即，美國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經驗顯示，民主化的進程必須是由下而上，慢慢扎根的，外國勢力的干預，和一廂情願複製西方（或是美式）民主的模式，其所產生的負面結果可能是對標的國家的人民造成更大程度的傷害和更多的苦難。

責任編輯：白如君

